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14）

## 下



## 日本明治维新

日本有句名言：“人并不是生来就被打败的。”19世纪前的日本，依旧痴沉在肇国宏远、圣土神朝的迷梦之中。面对欧美的船坚炮利，太和武士手中的东洋钢刀也只能黯然失色。

在屈辱和困苦面前，日本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奋起直追的道路。明治年间，日本励志图强，维新变法，终于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小邦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亚洲强国。

翻开它的历史，充满着血汗与苦泪。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与同时期的亚洲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依然是个闭关自守、自大落后的封建社会。

在当时，掌握国家权力的是由德川家康创立的被称作“武家政权”的德川幕府。

德川家康(1542~1616年)，原是一个地方诸侯(日本人称作“大名”)，在多年的群雄争霸战中势力逐步扩大，并于1600年关原之战中击败了与之对立的大名，从而奠定了日后总揽天下的基础。1598年丰臣秀吉逝世，部将德川家康乘机夺取了政权。1603年德川家康从日本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并在江户城(今东京)创设了封建军事专政政权，开始了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此后，德川一家世袭相承，又经十五代将军，在日本维持了长达260余年的幕府统治。

为了加强统治，德川幕府在日本全国实行了“幕藩体制”。德川幕府将军是国家权力的主宰者，还是全国最大的封建主，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他还操纵着铸造金银货币的经济大权。剩余的四分之三土地则由幕府分配给各地260余家大名。各地诸侯的领地(“亦称“藩国”)大小不等，参差交错。

德川幕府为了控制各地的大名，不仅极力宣扬所谓的“忠”、“诚”、“孝”等主从道德，还实行了“参觐交代制”。依据这个制度，凡大名都必须在他们的领地和江户城交互居住，当他们回到封地的时候，须将他们的妻子和家属留在京城作为人质。大名家族间的联姻，须经幕府批准；城壕非经幕府的许可不能兴筑；如需修缮，则应将建筑计划送呈江户。

至于天子及其公卿，则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他们不能过问政治大事，禁止和各地大名发生直接的接触；甚至天皇也是在严密的、表面上恭而敬之的监视之下，他的活动和各种仪节都由幕府制订的规章严加限制。

德川幕府沿用并发展了丰臣秀吉时期的等级制度。全国居民分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合称“四民”。这些等级是固定的，并规定了权利与义务。低于将军和大名的武士是封建领主的家臣和亲兵，他们靠土地和禄米生活，并享有免纳租税和佩刀等特权。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他们没有土地，而是按照租佃制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手工业者也是无权等级，德川幕府轻视他们，限制他们的活动。商人是四民之末，法定为社会下层，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起着重大作用。他们的财力雄厚，将军和大名不得不向其借债，使最富有的商人入籍武士家族进入统治集团，并能在国家政治、行政和财政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德川幕府中后期，日本的封建统治已经极度腐朽了。

在这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广大的贫苦农民自然难以逃脱任人

宰割的命运。德川家康曾说过这样一句尽人皆知的话：“加在农民头上的捐税就是要重到让他们不死不活的地步。”农民不仅要向领主缴纳收成的一半，而且还要负担各种名义的苛捐杂税。特别是在收获时节，官僚、衙役到处巡行，并且住宿在农民家。倘使招待欠周，则不是增加税额就是强征这一家的劳役。以至农民畏之如虎，“唯恐蒙受其害”。预征租税也是常有的事，有的预征一二年，有的竟预征到五六年。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民被迫丧失了世袭的领种土地，沦为佃农。虽然一年到头拼死累活的劳作，能送到佃农肚子上的却只是米屑、糠麸和稻秆等粗物。那些上有高堂父母，下有成群子女的农户，就更是穷困不堪，即使倾家荡产，典卖仅有的田地和房产，也犹不足以应付村吏的帐目，抵不过欠下地主的债务。农村经济遭到了破坏，人口减少和溺婴、堕胎早已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常事。

广大农民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时，暴动和起义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农民们的唯一出路。从1590年至1867年的270余年间，日本的农民起义多达2809次。而且，更有扩大的趋势。

1732年，日本发生了大饥荒后，第二年正月江户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市民暴动。饥民们袭击了平日里苛刻吝啬的米商、酒店老板和高利贷者。1785年大阪爆发的市民起义使幕府将军的脚下也有了颤动的悚觉。特别是1837年，学者兼地方警官大盐平八郎愤于当局腐败，领导发动了大阪市民暴动，这次事件虽仅经一天便被镇压下去，但是幕府的地方官吏率民众“骚乱”，并试图联合大阪近郊的农民，共同铲除为非作歹的官吏之举，则是前所未有的。幕府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幕府统治末期，大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也有较大发展。这些富商高利贷者是在为封建领主出售年贡物资，经营专卖物资或在经营高利贷中发家的。大阪、江户、京都等城市有一批组成为“株仲間”的商业垄断组织，他们以缴纳营业税和特许费为代价，从封建领主手中取得了某些商品的专卖权，因而得以任意抬高物价，获得巨额利润。大阪等许多大城市有一种被称为“两替商”的钱庄，经营存款和贷款、兑换和买卖金银、票据和汇兑等项业务。19世纪初，仅大阪富商高利贷者借给大名的债款就达6000万两（黄金），每年利息相当于大米300万石。有些大富商、高利贷者乘机挟制大名，取得了包税、专卖、甚至参与藩政等特权。

幕府统治末期的大商业和高利贷资本，虽然寄生在封建生产方式之上，与封建领主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但它又通过购销手工业品和贷款等途径，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联系，有些大商业、高利贷资本后来转化为近代日本工业资本。

幕府统治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不仅使封建经济基础遭到破坏，而且使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导致了封建关系和幕府制度的解体。

19世纪中期正是国际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迅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在欧洲确立了统治地位，进而大举东进，以建立世界性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亚细亚自然倍受长着金黄色头发的西洋人的“青睐”。

俄罗斯人虽有“北极熊”之称，扩张的行动却不迟缓。在18世纪末叶，帝俄便已远下萨哈林并威胁虾夷岛（今北海道），还三次派使出访日本，要

求开商通航，遭到了日本的拒绝。

这一年的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柏利率领由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冲入浦贺（今横须贺港），携带着美国总统致日本政府的信件，以武力相威胁要求日本开放沿海港口。

美国舰队的来临使平日里高枕无忧的日本统治者们震惊不已，一片混乱。幕府将军只好征询各地大名的意见，并把冷落多时的天皇搬了出来，企图让天皇应付局面。可是面对美国佬黑洞洞的炮口，日本又确实不敢挺起腰杆。在民族尊严与丧权苟生之间，懦弱无能的幕府选择了后者。第二年3月，日本人被迫同美国缔结了所谓《日美和亲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开辟下田、函馆两港口为美国舰船的停泊地，供给美国船只所需要的淡水、食品和燃料，允许美国在上述两地设置领事，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切权益，也应同样无条件地给予美国行使等。

日美条约的缔结如同决堤之水，英国、法国、俄国、荷兰也相继而入，迫使日本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的“友好条约”。

众多屈辱条约的签订，给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迷惘之中的日本人蓦然回首，悲哀地发现他们已失去了太多：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成了使西洋人竞相大饱食肠；领事裁判权使得在日本的欧美侨民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国家的关税也失去了自主，关税率被迫大大降低，而且还得由日洋协议规定；“租界”的设立，使在日本又形成了“国中之国”，洋人不仅可以租借土地，后来又发展为拥有永久租借权，甚至可以自行买卖和转让……

但是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准允外国人的商品进入日本，迫使日本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西洋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市场。仅1860~1868年，横滨港的进口贷物总额便增长了15倍，出口额也大约增长了5倍。其后果首先打击了日本的织布业和丝织业，素以丝织业闻名的桐生、西阵只得持续歇业，处境艰难。对于这些织业老板来说，面前也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转业，要么破产。洋大人的兴趣十分广泛，日本人的生丝、茶叶自难以逃过他们的眼睛。于是，许多日本农民便将精力转到桑蚕、植茶方面。可这样一来，日本岛上的粮食产量便大为锐减，物价飞涨的速度也和东洋人咕咕作响的腹内鸣声的频率差不了许多。如果说统治者在政治上的腐朽是社会浑浊的泉源的话，那么无节制的物价上涨则成了社会动乱的根由，以致民不聊生，贫苦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反抗斗争更为频繁。

米价的剧烈波动连同物价的腾贵对于幕府将军、大名及其家臣、武士等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作为收入的石米本是固定的，但是当换成货币应付高涨的物价时却觉得捉襟见肘。至于那些下级武士，更因囊中羞涩而被抛入真正贫困不堪的境地，原来就已松弛的主从关系已经十分紧张，武士们甚至产生了“恨主如仇”的情绪。

日本既已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幕府自然便成了众矢之的。出现在德川将军面前的，将会是什么呢？西方列强的入侵，幕府统治的腐败，经济、文化的落后，激发了日本有识之士对幕府制度的反省和批判，人心开始思变起来。

1825年，会泽正志斋著作了《新论》一书，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指出，日本所面临的局势已经到了“如不变彼、则为彼之所变，势不相容”的地步，必须要实行“船舰之制”、“水操之法。”民族主义者也四处游说，认为幕府对外缔结条约，是“不思国患，不顾国耻，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

地不容，神人俱怒。须据大义讨灭之、诛戮之。”而“幕府诸侯，皆为醉人，挟之无术”，“唯赖草莽崛起之人”，“辅佐天朝中兴。”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开始有了逐步的觉醒。

内忧、外患和切身利益的受损，使以往不能过问幕府政治的宫廷势力和一般没有参政权的诸侯大名开始互相接触，共谋倒幕。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早就不满于幕府的昏聩统治，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开国后幕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又使下级武士蒙受损失，对幕府更加不满。在不平等条约签订后，他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在人民群众运动推动下，积极开展倒幕活动。先天不足的日本资产阶级，追随其后，从经济上支援倒幕斗争。

长州、萨摩、土佐等强藩地处西南，受欧洲资本主义影响较大。这些藩里的下级武士改革派的实力较强，他们曾利用藩主同幕府的矛盾插手藩政并实行某些近代化改革。1858年，当幕府奏请天皇批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时，长州藩和萨摩藩的武士倒幕派会集京都，串联部分反对幕府独裁的皇族公卿，挟持天皇驳回了幕府的奏请，并谋划推翻幕府。主持幕政的大老（将军任命的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为维护幕府的权威，彻底肃清倒幕派势力，于1858-1859年对倒幕派实行血腥镇压。吉田松阴等七人被处死，西乡隆盛被驱逐（后被流放到大岛），下狱数十人，一些与倒幕派武士联盟的大名也遭株连。1860年，水户和萨摩两藩武士在江户城樱田门外刺死井伊直弼。樱田门事件后斗争日趋激烈。以萨摩、长州、土佐下级武士倒幕派为核心，同部分公卿、商人结成联盟，利用人民力量加强倒幕斗争。倒幕派利用大量传单向群众宣传：今天的生活困难是由夷狄（外国侵略者）造成的，而幕府是引进夷狄的罪魁，以此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

1866年初，在土佐藩商人、乡绅出身的坂本龙马和中冈慎一郎等人策划下，建立了萨摩和长州两藩倒幕派同盟。1867年后，安艺、土佐、肥前等藩倒幕派也秘密加入了这一同盟。

德川幕府自不会善罢甘休。1866年5月，幕府借口长州藩蓄谋叛乱，派遣大军讨伐长州。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幕府军对于他们的敌手的详情是所知不多的，只晓得高杉普作的部队唤作奇兵队，是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洋玩意装备起来的，但是等到了战斗打响时，幕府军终于发现他们的敌手是可怕的。那是支由贫穷武士、浪人、农民和町人所组成的军队，所有官兵都作战勇敢，所有服装、武器和训练方式都取法于欧洲。几番冲杀和突击，幕府军终于撑不住，败下阵来。这时，幕府的后院又开始起火，各地不约而同地爆发了40多起暴动。7月间，将军家茂在大阪于绝望中病死。无奈之余，幕府军只得在沮丧中撤回老巢。

1866年12月，德川庆喜继任将军。不久，孝明天皇突然暴毙，年仅15岁的明治天皇继位。

第二年5月，萨摩、长州、广岛三藩共同建立了倒幕攻守同盟。10月，在接到天皇“讨幕密敕”后，三藩大军合力东征，讨伐幕府，进军极为顺利。

面对如此内外交困的情势，德川庆喜被迫上表天皇请求“奉还大政”，但却只字未提交还兵马大权和所属领地之事。

以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为代表（高杉普作此时已因肺病而亡）的倒幕派自然知道这是幕府的韬晦之策，便将计就计，召开有朝廷公卿、各藩领主等参加的“小御所会议”，确定新政，颁布了要求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和国家“王政复古”的公告。

然而，片纸文告所宣布的新政权并不意味着它已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权力。德川庆喜虽然“奉还大政”，但仍拥有相当的军事、经济实力，并未把新政权放在眼里。许多忠于幕府将军的旧幕臣们，也是耿耿于怀，伺机而动。有些大名还上表于朝廷，要求“将大政再次委任给德川氏。”

1868年1月27日，德川庆喜借口“清君侧”，以会津、桑名两藩的兵力为先锋从大阪起兵进攻京都，拉开了日本戊辰战争（这一年为戊辰年）的序幕。在京都郊外的鸟羽、伏见两地，幕府军马与以萨摩、长州兵力为主的新政府军展开激战。德川庆喜这回可打错了算盘，政府军的宝剑之锋利，决心之果敢，战斗之顽强，大大超过了他的预想。此次战役仅经3日，幕府军便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德川庆喜也被迫逃回江户。尾随而至的政府军乘幕府上下一片混乱之际，攻占了江户。德川庆喜被迫投降。

于是，政府军乘胜肃清了盘踞在上野的旧幕残余，消灭了各地的佐幕派势力，历时一年半的国内战乱终于结束了。

日本1868~1869年戊辰战争是在“天皇亲政”、征讨德川庆喜“大逆无道”的名义下进行的新旧两种政权势力的内战。这场战争推翻了长达265年之久的德川幕府的封建军事统治，维护和巩固了以天皇为首的新政权，为日后的改革奠定了权力基础。

1866年12月，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逝世，年仅15岁的明治天皇即位。宫廷形势向有利于倒幕派方面发展。倒幕派力图利用明治天皇的名义，实行武装倒幕。1867年10月，萨摩、长州、安艺三藩倒幕派武士代表在京都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讨幕联军，同时与三井、鸿池等富商联系了作战经费。10月14日清晨，经过倒幕派在宫廷的串联，终于以天皇名义向长州、萨摩两藩发出了“讨幕密诏”。

将军德川庆喜得知对方的准备后，鉴于形势极其不利，乃接受前土佐藩主山内容堂的劝告，在宫廷发出“讨幕密诏”的当天，声明“辞去将军职务”，将“大政”“奉还”于天皇。至此，统治日本260多年的德川幕府名义上宣告结束。

1868年4月6日，日本天皇首次向臣民世人宣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怠倦；破除旧来之陋习，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振皇国之基础。”《五条誓文》以含糊的语句表达了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要求，表明了倾向近代化的意向。

1868年4月，明治政府颁布了《政体书》，确立了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法。确定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为“太政官”（国务机构），“天下权力一切归太政官”，加强权力集中。“太政官之权力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标榜近代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统一领导。自明治政府成立后，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逐步加强，西南各藩倒幕派领导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兄等人，成为明治政府实力派的官僚阶层。

在军事方面，明治政府建立起常备军和警察体制。

1869年和1871年，明治政府先后实行“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这两项措施是明治维新过程中的深刻变革。它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度，为建设中央集权国家和进行其他方面的资本主义改革奠定了基础。

新政权虽然得到了巩固，但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新国家对于日本人来说却还是个未知数。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求知识于世界”。

1871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对外派遣欧美使节团。由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率领的“欧美使节团”于同年12月23日离开横滨前往美国。半年以后，转向欧洲，途经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总计走访了12个国家，历时近二年。

这次出访几乎出动了新政权的主要成员达51人，相当于“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而此时的日本正值处在何去何从的路口上，是退回保守、落后的封建时代，还是迈向文明、进步的资本主义，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这次考察的结果。真所谓“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

岩仓一行的出访使他们获得了前所未闻的知识，作了一次有效的“洗脑”，并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岩仓一行对英国的考察更是足足花了4个月时间，走遍了伦敦、朴茨茅斯、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25个城市，经过如此紧张的调查了解，终于使岩仓一行认识到：“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而英国“其君臣一致，以其国家天然之利为基，扩大财用，以致巩固国家根基之伟业，是我国……当为规范者”。

德国的立宪君主制也为岩仓一行所瞩目。当时的德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装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的军事专制国家。”这同当时的日本极为相似，也正是日本“王政复古”所要实现的目标。日本“可取法者以德国为首”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其中，德国首相俾斯麦所宣扬的“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的“良言”，更深深地打入岩仓一行的心坎。因此，岩仓一行回国后，在移植资本主义工业的同时，便准备按照德国的政体来制定“政典规则”，并把“富国强兵”作为重大的任务之一。

除此而外，欧美国家的教育、法律、福利、产业、财会等制度也都给岩仓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欧美使节团”的出访是极其成功的，它不仅使新政府中的主要决策官员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而且也找到了适合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

对欧美诸国的出访，使日本的决策者们认识到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富强国家。而此时，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幼弱，封建的高利贷资本还没有完成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已有的一些产业又主要是军事工业。于是，日本政府便决定利用国家权力，通过“官办企业”，来移植和助成近代工业社会的产业基础。

1870年，日本政府成立了工部省，以“劝奖百工，开明工学，管理矿山；铺设与维修铁路、通讯、灯塔，制作船舰、机械，测量海陆”，经营重点集中在矿山和铁路两个方面。

对外战争也是日本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有效手段之一。早在1874年，日本便通过“征台之役”，从中国强行索取了50万两白银。1876年，又迫使朝鲜与之缔结了《日朝修好条约》，开始堂而皇之地掠取朝鲜的黄金、粮食和工业原料。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日本竟于1894年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从腐败的清王朝手中夺取了2.3亿两白银，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

通过血与火掠夺而来的资本，犹如一剂强心针，使日本近代产业兴盛起来。但是，由于产业基本上是官办企业，对于私人资本的成长便不免成为一

种障碍。而且，官办企业一时还无法适应市场自由竞争。鉴于此，1880年，日本政府终于发布了《工场处理概则》，规定：除去军事、造币、炼矿、冶金、通讯、印刷部门外，将纺织、机械制造等工厂卖给民间，以后又进一步扩大拍卖范围。而且，这些官办企业的处理均为折价出售和分期偿金，甚至无偿让给的方式，这便壮大了私人资本的实力，促进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并为日后垄断财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此时的日本已变成了一个具有浓重军事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工业国。

日本在短时期内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教育的勃兴。

早在“欧美使节团”出访之际，西方的教育制度便是日本官员考察的重点。木户孝允在考察时曾在给国内文部省官员的信中写道：“我国今日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如果对后人子弟的行为，不予以格外的重视，那么日本国家的保安是没有指望的”，“为了防范10年以后的弊病，唯有兴办学校。”

据此，1872年8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学制》规定，全国教育行政统归文部省管辖；设大学8所，中学256所，小学5.376万所；1904年以后，日本适龄儿童的就学率已近于100%，切实体现了政府所要求的“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经过数年的努力，一个强大的日本终于出现在世人面前。以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基础，明治政府历时近30年，修改以前同欧美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国家主权，并跃居为亚细亚的首雄。

明治维新是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也是日本避免沦为欧美殖民地的转折点。的确，这场变革在日本历史上委实意义重大，它改变了日本的社会性质，使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日本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便走完了西方诸国需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进程，这不能不说是明治维新的作用。



## “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德意志的统一

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色当战役，由德国总参谋长毛奇率领的普鲁士陆军大获全胜，为普军写下了光荣的历史。这次战役，使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兰西帝国在巴黎被推翻，欧洲的领导宝座上赫然坐上了威廉一世，德意志成了显赫一时的大国。

然而，普鲁士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离不开普鲁士宰相的聪明和残酷，是俾斯麦推出了著名的铁血政策，以普鲁士军队的枪炮和鲜血缔造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大厦。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意志各邦君主加强了政治上的反动统治。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完全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除奥地利恢复了君主专制外，多数邦国保存了革命时期建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允许资产阶级有某些政治自由和参加议会的权利。

1850年5月，普鲁士国王颁布了“钦定宪法”，确定了国会制度。国会分上下两院，贵族院由国王任命的显贵组成，众议院根据财产资格按三级选举制产生，这就保证了容克（贵族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国会有表決法案和批准预算的权力，但国王掌握行政、军事大权，并且拥有对国会立法的否决权。内阁大臣不对国会负责，而对国王负责。普鲁士逐渐由封建君主制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君主制。

19世纪50年代后，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1850年到1870年，其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多，重工业部门的产量每10年就翻一番，如煤的产量由1850年的700万吨增至1870年的3400万吨，而铁则由20万吨猛增至140万吨。此外机器制造业、铁路建筑等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工业与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带动下，使商业和信贷事业也日益发展壮大。同一时期内，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亦有大量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而实现的，而容克地主也逐步地资产阶级化了。

伴随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消除其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封建割据状态的要求更加强烈了，统一问题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当时德国存在着解决民族统一任务的两种可能性，也就是存在两条道路。一条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群众用革命手段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经济政治势力，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是一条符合德国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另一条是由普鲁士或奥地利领导的，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道路。

德国资产阶级虽然渴望统一，但他们不敢发动革命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他们害怕无产阶级卷入革命会造成对自己的更大威胁，而是指望能和平地不流血地达到目的。

普鲁士和北部的资产阶级主张由普鲁士领导，排除奥地利，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他们结成所谓“民族联盟”，鼓吹“小德意志道路”。而奥地利和南部诸邦主张由奥地利领导，建立包括奥地利在内的统一的君主国。

19世纪50—60年代，是德国两条统一道路激烈斗争的时间，究竟哪条道路取得胜利，主要取决于当时德国阶级力量的对比。

50年代末，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德国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出现新高涨。普鲁士为了在普、奥争霸中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并把日益壮大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1860年政府向议会提出军

队改革方案。扩充军队，增加军费。1861年，资产阶级成立进步党，提出召开全德议会实现统一的要求。在新选出的议会中，进步党占据多数，再次否决了军事预算。为了打击资产阶级，1862年，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担任政府首相兼外交大臣。

俾斯麦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化的容克（贵族地主）。1815年出生于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的雪思豪森庄园祖宅、一个世代容克的家族。2岁时随家迁往波美拉尼亚的克尼帕霍夫的庄园。就其财富及社会地位而言，俾斯麦家族并非第一流的，但是他身上却深深地打下了容克的专横、暴戾作风的烙印。

在大学期间，他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影响。在1839年他放弃了候补文官之职，而回乡经营农业庄园。俾斯麦改变了以往的经营方式，在庄园上实行深耕、改进农具、作物轮种，雇用长工进行耕作，但整个庄园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的产品越出本地范围，而同国外市场联系成一体，卷入了价值经济大旋涡中去。因此，等到了19世纪50年代初，俾斯麦就了解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利益和意义，了解到如果不改变其经营方式，则容克阶级就会完全破产而为历史的发展所抛弃。

经济地位上的转变，也决定了俾斯麦政治立场上的转变。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俾斯麦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1847年他是普鲁士联合邦会议员，其政治行为、观点都是竭力维持容克阶级利益的。1848年大革命期间，在普鲁士议会中，俾斯麦公开声称：“我是一个容克，我一定要压倒革命！”他曾向国王建议用武力镇压革命。其政治主张是亲俄、亲奥、亲法；即那些一贯保证德国分裂割据的势力。1851年以后，俾斯麦政治态度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俾斯麦认为：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那只不过是延期而已，德国统一趋势是无法阻止的。

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德国是俾斯麦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为此，他从一个亲奥派转变为一个激烈地反奥派，因为只有奥地利是普鲁士争取德国统一领导权的主要对手和障碍。而俾斯麦在1859年任驻俄公使、1861年改任驻法大使期间，充分认识到沙俄与法国统治者的意愿与图谋：一个统一的德国强邻会不利于它们的，因而作为德国的东西邻，它们都不会坐视德国的统一，而会采取手段来阻止这一进程。通过这些，俾斯麦认为，普鲁士要统一德国，必须诉诸于武力。因而，他是支持威廉的。

1858年秋，普鲁士威廉亲王以摄政名义，取代其神经错乱的哥哥——腓特烈·威廉四世，取得统治国家的权力。

1860年威廉摄政王为在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取得军事优势，并加强对内的实力地位，而授权陆军大臣罗恩将军着手进行军事改革。罗恩将军要求增加军费，改两年服役制为三年服役制。就此问题，威廉与议会产生了矛盾。更由此而引起了长达4年之久的“宪法纠纷”。

俾斯麦担任首相后立即推行“铁血政策”。他在议会上公开宣布：“德意志看得起普鲁士，不是它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实力……当前各种重大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演说和大多数人的决议……而是靠铁和血。”他不顾议会反对，实行军事改革，扩军备战。他看透了资产阶级惧怕人民群众、色厉内荏的致命弱点，当议会要求罢免俾斯麦时，他回答说：“我们这里不是英国，我们这些大臣是国王的奴仆，而不是你们的奴仆。”“铁血演说”传出后，朝野为之震惊，怯懦的威廉一世也为之害怕，但俾斯麦很快就以军官的荣誉取信于威廉一世并获得了成功，威廉一世放弃了原先的解除俾斯麦职务的任

何想法，俾斯麦便肆无忌惮地放手大干起来。为了实现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而统一德国，俾斯麦积极地展开外交活动。

1863年8月2日，威廉一世在加斯泰国会见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时，约瑟夫向其发出邀请，参加一次由他主持的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王侯会议”，并将主要讨论由奥地利提出的改革德意志联邦的计划。威廉犹豫不决，而俾斯麦则认识到一旦奥地利和南德各邦的选票加在一起，必然会使普鲁士在议会中丧失德意志政治中的领导权，因而坚决反对，因为“王侯会议”若无普鲁士参加，是不可能通过一个改革德意志联邦的计划的。在俾斯麦的坚持下，威廉一世终于没有参加这个有30位王侯参加的“王侯会议”，而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

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普鲁士十分有利：克里木战争以后，俄、奥关系恶化；自1859年法、意联合对奥战争后，法、奥矛盾日益加深；而英、法自克里木战争后，在近东也开始了摩擦……此时的欧洲诸强，由于处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局面，英、法、俄不能联合行动，而奥地利在欧洲也基本孤立，于是俾斯麦利用此大好时机，发挥其外交才能，纵横捭阖。他对奥地利采取恫吓与利诱相结合之政策；对俄国则尽力保持其“友好中立”；竭力延缓法国对普鲁士的打击；并尽可能保持与英国的靠拢。从而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

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条件已日趋成熟。这时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在德意志各邦中已占据首位，1853年关税同盟恢复后，小德意志地区经济已同普鲁士“一体化”。经济上的优势为它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1864年，俾斯麦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在丹麦和易北河之间有丹麦王国占领的两个公国：什列施维希和霍尔斯坦。霍尔斯坦的居民基本上是日耳曼人，1815年加入了德意志邦联。什列施维希南部是日耳曼人，北部是丹麦人。丹麦的民族主义者企图吞并这两个公国。1863年末，丹麦新国王颁布新宪法，把两个公国的政治制度与丹麦统一。这就引起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抗议，俾斯麦以此为借口，于1864年2月挑起了对丹麦的战争。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他把奥地利也拉入战争。普奥联军迅速击败丹麦主力，10月签订和约，丹麦被迫放弃两个公国，由普鲁士、奥地利占领和管理。

1866年，俾斯麦发动了对奥战争。对丹麦战争结束后，普、奥矛盾激化。俾斯麦认为：“如果奥国不在战场上遭受失败，它不会允许普鲁士成为统一德意志的主宰。”为了准备对奥战争，俾斯麦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4月，普鲁士政府和意大利缔结了同盟条约，又取得法、俄两国不干涉德意志内部事务的保证。6月17日，普鲁士出兵霍尔斯坦，挑起对奥战争。同日，奥地利发布宣战书，第二天，普鲁士对奥宣战，普奥战争爆发了。

战争一开始普鲁士军队就占领了萨克林与黑森选侯国，6月29日就迫使汉诺威投降了。尚在6月24日普、奥开战前，普鲁士就控制了大部分的北德意志邦国。

由于意大利的进攻，奥地利被迫两线作战。在南线的意大利战场，意军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都被击败了。但在北方的主战场、波希米亚战场，奥地利人遭到了沉重失败。1866年7月3日，在捷克境内的萨多瓦战役中，双方投入了50多万军队，举行了一场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决战。由于普鲁士成功地进行了军事改革，而使军队得以精良武器装备，如撞针发射枪、装有来复线的大炮等，而奥地利则显得落后了若干；尤其是毛奇英勇果断的指挥，

加上普军由于认为是为德意志的统一而战，士气更为高昂；此外，普军的铁路快速调动，电报统一指挥都发挥了作用。此一役，奥军损失惨重，死伤、被俘约有4万之众。

7月14日，普军逼近奥国首都维也纳，奥军被迫请求法国调解。8月23日普、奥在布拉格签订和约，规定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承认普鲁士在莱茵河以北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什列施维希、霍尔斯坦以及协助奥军作战的汉诺威、黑森、拿骚和法兰克福市划归普鲁士。

对外战争的胜利巩固了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

1867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成立了。普王威廉一世为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而俾斯麦则任联邦首相。并且把原来一直与奥地利关系不错的南德四邦——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黑森—达姆斯塔特与德意志联邦缔结关税、贸易协定，其武装力量则由普鲁士参谋本部监督。

俾斯麦通过同奥地利的战争，把奥地利完全从德意志联邦中排斥出去，完成了“争霸德意志的斗争”。对于普奥战争，毛奇在多年后写道：“1866年的战争，并非因为普鲁士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开始的，这是一场政府早就预见到了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争夺领土，而是为了争夺想象中的利益，为了争夺权力。”

普奥战争后，南德四邦（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黑森—达姆斯塔特）由于法国的阻挠，没有参加北德意志联邦。因此，对法战争就成为实现德国统一的最后步骤。法国拿破仑三世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称霸欧洲，极力反对德国的统一，并准备发动对普鲁士的战争，而俾斯麦则企图通过对法战争最后完成德国的统一，并夺取法国矿产区阿尔萨斯和洛林。

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为借口，挑起了普法战争。9月1日至2日，法军在色当战役中惨败，拿破仑三世率10万大军向德军投降，战争以法军失败而告终。

1870年底，南德四邦加入了德意志联邦，成立了德意志帝国。

1871年1月1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普鲁士国王登上了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宝座。4月，新选出的帝国议会批准了德意志帝国宪法。根据这一宪法，德意志帝国由22个自主的君主国、3个自由市和1个直辖区组成，最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德意志统一的完成是历史的一个进步。它结束了德意志政治上长期分裂的局面，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统一了各邦的经济制度，发展了交通事业，实行了保护关税政策，推动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统一同时也为德国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统一后，德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由于一个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取代了普鲁士，从而使1815年以后协作体制的相对稳定的“五头政治”解体了，而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期。

在德国统一完成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军国主义在德国的泛滥，而这在后来的大半世纪里给德国人民、欧洲甚至于世界人民带来了祸害。

## 辛亥革命

1840年，帝国主义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政府，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广大的中国人民，被抛进了水深火热之中。“几番回首中华望，亡国悲歌涕泪多”，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1901年，八国联军的炮声未息，耻辱的《辛丑条约》便在北京签定了，腐败的清政府全然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华民族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之中。然而“号角一声，中华崛起”，一场席卷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人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创立。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民主革命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成立以后，一方面和保皇派展开激烈论战，对保皇派进行有力的思想批判；另一方面，又坚持把武装斗争放在革命的首位，对腐败的清王朝展开了武器的批判，革命派以“杀身求共和，流血殉自由”的英雄气概，先后在各地组织和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但是，这些起义由于计划不周，力量单薄，都以失败而告终。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檳榔嶼召集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骨干开会，会上总结了以往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定集中全力充分准备，在广州发动一次新的大起义。广州起义经过半年筹备，集中了同盟会主要的人力、财力，于1911年4月27日爆发。

起义开始后，黄兴率敢死队120多人直捣总督衙门，总督张鸣岐仓皇而逃，在捣毁和焚烧了总督衙门后，起义军与反扑的大队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巷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起义军歼灭了大量清军。然而，由于双方势力相差悬殊，起义军寡不敌众，终于失败。事后，革命烈士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收殮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郊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它唤醒了全国民众，也震撼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革命党人的悲壮斗争，鼓舞激励着人们继续前进，清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在革命党人接连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愈来愈高涨。尤其是辛亥革命前一年，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抢米等形式的反抗事件达二三百次之多，遍及全国各地，“山雨欲来风满楼”，它预示着民主革命高潮的临近。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改良派为了抵制革命的发展，大声疾呼恳请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清政府为了顺应舆论，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并借“立宪”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以避开革命风暴的冲击，于1905年派刚毅等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开始导演一幕“预备立宪”的丑剧。

然而，清政府压根儿没有立宪的诚意，它始终只是把立宪作为幌子欺骗人民而已。随着一桩桩所谓“宪政”的举办，清政府立宪的丑剧也就一幕幕地败露，最后以1911年皇族内阁的设立而宣告彻底破产。广大民众也彻底看清了清政府的本质。

清朝“预备立宪”的骗局揭开以后，各界人士都十分愤慨。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反清斗争的烈火也越烧越旺，就在这时，爆发了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铁路是国家的交通命脉。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采取种种手段掠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修筑一条铁路就意味着控制了这条铁路以及控制了沿线地区，因此，随着铁路利权的不断丧失，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这一切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深恶痛绝和强烈不安。一些爱国绅商纷纷起来倡议自筹股份修筑铁路，以保利权而救国家危亡。清政府为了笼络资产阶级，对商办铁路运动开了绿灯。此后，各省商办铁路公司陆续成立。

商办铁路的兴起，起到了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这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惶惶不安。各列强先后采取种种手段，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着清廷取缔商办铁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开始改变对各省商办铁路的态度。

1911年5月，清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铁道干路国有”，实质上就是把已经批准各省自办铁路的权利强行收回，以“国有”为名，将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以换取它们的支持，以此来保住自己的统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激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人民爱国保路同清廷卖国卖路的矛盾迅速激化。首先被清政府拍卖出去的是川汉、粤汉两条干线，而这两条干线在收归商办以后，已先后筹集资金4000多万两，不仅地主、富商成为股东，连农民也拥有股本。清政府出卖路权，不但丧失国家民族主权，还直接损害四省广大人民切身利益，这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是，湘、鄂、粤、川等省的保路风潮迅速爆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举行万人大集会，进行抗议活动，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也举行会议，一致反对“铁路国有”。

四川省保路运动声势浩大，斗争最为激烈，因为在四川铁路公司的股本中，有着大量劳动人民的股本，所以川汉铁路的权利问题，与四川人民密切相关。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4000多人在成都开会，当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表示要据死力争。各州县也相继成立分会，不到半个月，会员发展到十万多人，参加“保路同志会”的阶层非常广泛，有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甚至还有和尚与道士。

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下，保路风潮迅速发展，这使得清政府十分恐慌。8月，素有刽子手之称的赵尔丰被任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采取了高压政策。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等人，企图使保路风潮因群龙无首而自动解散，消息一传出，成都立刻沸腾起来。数万名群众有的头顶光绪牌位，有的手握香柱，潮水般涌向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被捕诸人。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赵尔丰竟然命令卫队开枪扫射，一时间枪声大作，请愿群众死伤无数，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并没有把四川人民吓倒，反而促使他们迅速觉醒，保路运动迅速演变成武装起义，这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

早在8月份，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召集各路哥老会首领举行会议，决定发动起义，把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在成都血案发生的当天，龙鸣剑把800块写有“省城业已发难，望各地同志速起救援”等字样的木板投入江中，传到沿江各地，各地群众闻讯纷纷揭竿而起，各方向成都汇集的起义军

有 20 万人，把成都团团围住，赵尔丰和清军吓得紧闭城门，龟缩城内。

清政府被四川的革命形势吓得惊慌失措，急忙调川粤汉铁路暂办大臣端云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这就造成武汉守备空虚，给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入川镇压的新军尚未到达，武昌城头便已响起了起义的枪声。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华中地区的咽喉。它既是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据点，又是清王朝统治的一个重镇，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一向非常尖锐，一直是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地区。早在 1904 年 7 月，武汉就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了“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汉进行了长期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首先把新军作为联络的主要对象。他们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发展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到武汉起义前夕，湖北新军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同时倾向革命的人与日俱增。湖北革命党人还在学生、会党和其他社会力量方面也争取了大量的革命者和同情革命的力量。

四川保路风潮发生以后，清军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武汉守军立即锐减，起义的时机已经迅速成熟。9 月 24 日，湖北革命党人召开文学社和共进社联席会议，成立了起义的统一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任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并制定了起义的详细军事计划，准备随时发动起义。

10 月 9 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受伤。俄国巡捕闻声赶来，逮捕了几名没来得及逃走的革命党人，还搜走了革命党人的名册和起义的旗帜、文告、印信，转交给清政府。

在接到俄国巡捕送来的起义旗帜和革命党人的名册之后，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紧闭四城城门，按名册在全城搜捕革命党人，顿时，武昌陷入一派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

在这危急时刻，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迅速自动秘密联络，准备发动起义。10 月 10 日晚，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革命党人熊秉坤率领下，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紧接着，步兵、炮兵和军事学校中的革命党人和爱国者纷纷响应，武昌城内一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军终于攻下督署。湖广总督瑞澂走投无路，只好从后花园凿墙而逃。革命军的大旗飘扬在黄鹤楼上空的晨曦中，武昌起义胜利了！11 日晚和 12 日晨，汉阳和汉口又被攻克，武汉三镇胜利光复。革命军的旗帜在武汉三镇迎风飘扬，宣告了武昌起义的胜利。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武昌起义也叫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革命政权，以便统率各路力量，乘胜前进，把革命的火焰迅速扩展到其他省区去。于是，10 月 12 日，革命党人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性质的湖北军政府，公布了《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和受封建旧思想的影响，革命党人不懂得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错误地认为，只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才能号召组织政府。当时革命形势发展之快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孙中山正在国外，黄兴在香港，发动武昌起义的总指挥部的领导人有的牺牲了、有的被捕了、有

的外逃了，而在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觉得自己身份太低，不足以号召四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拥戴川军军官黎元洪担任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原来是湖北新军二十八混成旅的协统。平时对下级比较温和，在新军之中，有一定的威望，但是，他一向是个反对革命的旧官僚。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他逃到一个下属家里躲避，革命党人把他从床底下搜出来，用枪逼着他当上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身不由己地被逼到都督的职位上。起初，他对军政府的工作不问不闻，不与任何人交谈，甚至不进饮食，就像一个泥菩萨一般。于是，革命党人又组织了一个谋略处，以负责日常工作。当革命党人强迫他剪掉辫子时，他痛哭流涕，如丧考妣。然而，坐等几天之后，看到武汉三镇起义都成功了，胜利的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于是，黎元洪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开始争夺军政府的大权。

武昌起义的消息震动了全国。武昌城头的枪声，就像在火药库里点燃了导火线。顿时，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纷纷响应，革命风暴迅速席卷了神州大地。到11月初，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3个省和上海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而独立，许多州县还相继建立了革命政权，清王朝的统治，在全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已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武昌起义后，全国纷纷响应，但当时的形势又是极其复杂的。

首先是在宣布独立的各省中，普遍出现立宪派和旧官僚、旧军阀相互勾结，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严重局面；而革命内部却涣散无力，莫衷一是，并开始分化。

各省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旧军官相勾结，采取各种不同形式，进行夺权活动，有相当一些省份同湖北的情形一样，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利用革命派的软弱和幼稚而窃取了政权，如陕西、江西、山西、浙江、江苏等省就是如此。有些省份则在所谓“和平光复”的名义下，进行了夺取政权的活动。还有些省，立宪派和旧官僚则采用了武力手段从革命派手中夺权，湖南便是这一类的突出例子。湖南的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最早，而反革命的反扑也最迅速、最激烈。1911年11月1日，湖南立宪派的头子、独立后的参议院议长谭延闿，勾结新军的一个营长，突然发动兵变，杀死正副都督焦作达、陈作新，然后，他自己出任湖南都督，革命党人的新政权，仅仅维持了10天，便被消灭在血泊之中。几个月后，由革命派掌权的贵州新政权，也同样被夺取。上述一切说明，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全国革命高潮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以作为革命的领导核心。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革命党人内部发生了矛盾。同盟会总部所在地上海和首义地区武汉形成两大对立的地方集团，都想争夺临时政府的最高权力。11月，两地分别向各省发出通电，要求派代表商定建立中央政权的问题，后来经反复协商，才决定各省代表会议在武汉举行。然而就在此时，反动军队加强了对武汉的进攻，革命军作战连连失利。因此，当江浙革命联军攻下南京后，会议便只好又改在南京举行。会议因对临时大总统的人选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致使临时政府陷于难产之中。就在这时，深得国内人望的孙中山从海外回国，这个难题才得以解决。

正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之后，立即经欧洲返回祖国，于12月25日抵上海，受到黄兴等人热烈欢迎。由于他的崇高威望，29日，各省代表以16对1票的绝对多数，选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前往南京，在上海车站受到一万多群众



的热烈欢迎。车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各站都受到了上万群众的热情欢迎，“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到达南京时，各街店户张灯结彩，城内百姓，拥满街道，欢迎孙中山的到来。

当晚，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就职，宣告了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国新纪元的开始。临时政府决定，以 1912 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不久，各省代表又增选黎元洪为临时政府副总统，接着，又成立了临时参议院。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长期进行的民主革命的产物，是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在这个政权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占了统治地位。在它存在的 3 个月内，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政策、法令。其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措施：1. 提倡民主，保障人权；2. 保护工商，振兴实业；3. 简从节政，革除弊习；4. 改革学制，鼎新教育等各项措施。

所有这些政策法规，都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原则、利益和愿望。由于临时政府大力提倡兴办实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临时政府采取了各项改革教育的措施，使新式学校有很大发展；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新闻出版事业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南京临时政府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是不坚决的。它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企图以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它放弃了“平均地权”这个具有很大号召力的口号，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使革命失去了农民阶级这个最有力的依靠和支持。这样，南京临时政府的许多法令措施就形同虚文，得不到彻底执行。

袁世凯是个权欲熏心的野心家，又是个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在 1908 年光绪和西太后相继病死后，他被当时的摄政王载沣罢官，回到河南老家“养病”。但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并不就此罢休，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变化，待机而起。

武昌起义后，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忙派北洋军队赶赴武昌镇压革命。北洋军队是袁世凯一手培植的，将领多是他的心腹，由于袁世凯在背后的操纵，他们并不听从清王朝的指挥，致使前线作战屡屡失利。

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清政府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最初，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要他带领北洋军队，扑灭革命烈火。诡计多端的袁世凯感到夺取权力、建立独裁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乘机向清王朝索取军政大权，他觉得湖广总督权势太小，便借口“足疾未愈”，不肯出山。清王朝只好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但是，袁世凯仍不满意，进一步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与他军事全权，保证供应充足军饷等条件。这时，宣布独立的省份越来越多，清政府的统治已危在旦夕，清王朝只好被迫屈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清的军政大权已落入袁的手中。这时，他才肯走马上任，准备镇压革命。

首先，袁世凯指挥北洋军队攻占了汉口、汉阳，威胁武昌。然后，他便开始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他一面借革命势力来恐吓清统治者，逼迫清帝退位；一面又用清朝军队来威胁革命党人，要革命党人把新政权交给他，狡猾的袁世凯，企图以左右逢源，两面开弓的作法，来坐收渔人之利。

这时候，帝国主义看到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朝不保夕，便开始物色和扶植新的走狗，来扑灭革命，他们的兴趣逐渐转到握有巨大军事实力而又对帝国

主义十分忠顺的袁世凯身上；混在革命阵营内部的立宪派，也乘机与袁北呼南应，内外勾结，极力把南方引向妥协拥袁的道路上去。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立宪派的唱和下，革命派中的主要领导人态度逐渐软化。12月18日，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和南方独立各省推定的代表伍廷芳，由帝国主义牵线，在上海正式开始谈判。

南北和谈的开始，就是革命势力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开始。

不久，南北和谈即达成默契，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并承认共和，南方革命党人便表示愿意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留给袁世凯。对此，袁世凯表示非常满意，他准备爬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并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打乱了袁的如意算盘，眼看将要落入自己手中的总统权柄被转授到革命领袖孙中山手中，对此，袁恼羞成怒，逼着唐绍仪辞去和谈代表职务，致使和谈公开破裂，同时对南方进行武力恫吓。

帝国主义公然出面支持袁世凯，声称只有由袁“统一”南北，才承认中华民国。他们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在军事上、经济上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在列强和袁世凯的要挟下，南方立宪派、旧官僚和失节革命党人加紧拥袁排孙的活动，他们联合起来，要求孙承认和接受南北秘密达成的“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的协议，甚至有人诘问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谈，难道是舍不得大总统的职位吗？”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对袁世凯妥协。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赞成共和，就让袁当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保证后，如同吃了定心丸，马上在北京演出一幕“逼宫”的活剧。袁一面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发表一个要求共和政体的通电；一面又大造革命党人潜伏京师、要发生暴动的谣言，以威吓朝廷。正当这时，革命党人彭家珍暗杀了坚持反对退位的顽固王公良弼，这一刺杀行动，使皇族心胆俱裂，对袁的谣言深信不疑。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清帝溥仪退位，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根据前约，于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同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接着，孙中山提出三个附加条件：1.临时政府设在南京。2.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任。3.新总统必须遵守一切法制章程。

孙中山提出三个条件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是想让袁世凯离开他的老巢到革命势力强盛的南方来，并用一部《临时约法》来约束他，防止和阻制他独裁。

袁世凯的势力和地盘都在北方，他当然不愿意离开他苦心经营并赖以发迹的根据地。于是，他一方面表示北方秩序急需维持；另一方面，又串通各国驻华公使，取得他们的公开支持。因此，帝国主义各国一致表示，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否则，不予承认。

然而，孙中山并不因此而退却，他坚持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为专使，到北京迎袁世凯南下。老奸巨猾的袁世凯表面上热烈欢迎专使团，表示极愿早日南下，暗地里却指使他手下将领于当夜发动“兵变”，北京城内顿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接着，保定、天津、通州等地也发生类似“兵变”。帝国主义者也与袁世凯积极配合，借口“保护侨民”，调兵遣将。

被“兵变”吓坏了的专使们，听信了袁世凯要留在北方维持秩序的谎言，

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建议迁就袁世凯，临时参议院不顾不久前刚通过的三项条件，于3月6日通过决议，允许袁世凯留在北京就职。革命派又一次妥协，袁世凯又一次取得了胜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标志着孙中山调虎离山计的失败。但是，孙中山仍坚持用第三项条件来约束袁世凯。就在袁世凯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参议院匆忙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另外，还规定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然而，袁世凯一旦大权在握，一纸空文的《临时约法》是束缚不了他的手脚的。他一面假装诚恳地表示坚决拥护并执行《临时约法》，一方面又说它尚不完善，将来还要修改。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仅仅历时三个月就夭折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

辛亥革命的功绩，在于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同时，辛亥革命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民主自由之花一度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放。在失败的沉痛中，人们继续进行革命的探索，终于在度过八年的黑暗之后，迎来了新民主主义的曙光！

## 内燃机推动工业革命

内燃机的发展是从蒸汽机中获得启发,在 19 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动力机器。自从蒸汽机产生以后,通过对其功能的观察和实际使用,人们体会到了它的许多优越性,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改革的思想。蒸汽机的发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内燃机的发明和运用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了西方近代史的新篇章。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统治政权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取得了极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到了 18 世纪,资产阶级在工业领域里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革,这就是著名的工业革命。这场产业革命是以生产工具的革新为起点,以发明蒸汽机为代表的深刻的大变动,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块崭新的里程碑。蒸汽机的产生和运用是动力技术发展的第一次革命,也是 17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

英国资产阶级最先取得了与封建政权斗争的胜利,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起来。英国的棉纺织业是很发达的。传统的纺织业是将纺纱和织布分开的,且均为手工。1733~1738 年间,凯伊发明了飞梭,将织布速度提高了两倍。这样就造成了纺纱供不应求的局面。适应这种情况,1764 年织工兼木匠哈格里沃斯制造出了“珍妮机”。珍妮是他女儿的名字。据说有一天珍妮将纺纱车打翻了,哈格里沃斯看见横装的纺锤直竖起来仍然转动因而受到启发,将横装的纺锤改为竖装,并将数目增加到 80 个。这种纺车体积不大,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费用低廉,给纺纱生产带来了最初的动力。恩格斯评价它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工人状况的第一个发明。

后来,棉纺织业中的各种工作机陆续出现,且日渐完美。除了纺纱机和织布机外,还出现了净棉机、梳棉机、自动卷扬机、漂白机、整染机等,使得棉纺织业中的机械化形成了“一条龙”。不久,其他行业诸如毛纺工业、呢绒工业、冶金业、采煤业、印刷业等都有不少工作机发明问世。

随着各种工作机的出现,动力的需求越来越急迫。在这种要求的直接诱使下,蒸汽机动力出现了。

人们很早就有过运用蒸汽机动力的尝试。古罗马时代的希罗制作过一种用蒸汽推动的机械玩具;意大利的达·芬奇设计过用蒸汽开动的大炮图样;16 世纪末包尔塔描述过蒸汽压力提水的工具;英国的大卫·拉姆齐于 1630 年创造了用“火力从矿井抽水的装置”;17 世纪中期,英国的伍斯特伯爵发明了制水引擎,一种“用蒸汽机使水上升控制水的机器”;1698 年,托马斯·萨弗里上尉根据包尔塔原理制造了一具蒸汽泵,用于矿井排水,被人称之为“矿工之友”。显然,这些都是热力技术发明的萌芽,是蒸汽机诞生前的可贵尝试。

1705 年,英国人托马斯·纽可门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蒸汽机。纽可门是一位铁匠和铁商,他所制造的这台“大气式”蒸汽机明显优于前人。它的装置除传统的蒸汽机外本身还附有一个能自身带动的抽水机。抽水机和蒸汽机的相连处有一根平衡横梁,梁的一端和活塞相连,另一端与抽水机相连,活塞在汽缸中上下移动,便能带动抽水机。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汽缸内蒸汽的冷却使活塞上下运动,通过横梁带动抽水装置,即利用大气对真空的压力来做功。

纽可门蒸汽机发明后，立刻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是，这种机器只能作往复运动，限制了运用范围，耗煤量大，效率低，因此急需改进。

1765年，瓦特设计了一台与纽可门机同样尺寸的新机器，其耗煤量只有原机的六分之一，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但瓦特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思考着如何进一步地提高效率。他针对蒸汽热量浪费的问题，设计了一个改进方案，把冷凝工序从汽缸中分离出来。通过一个阀门把蒸汽引到一个经常保持低湿的冷凝器内冷却，使汽缸始终保持着高温状态，同时还采用蒸汽泵排除汽缸内的空气和残余的积水。1769年，瓦特的方案被批准，获得了专利，并制造出了第一部单动式蒸汽机。1776年，第一部实用机研制成功，使蒸汽机逐渐在工厂矿山等地得到广泛的使用。

后来，瓦特花了20多年的光阴，克服了无数的困难，终于造出了效率高、体积小，可以带动多种机械的新的通用蒸汽机。它的耗煤量每马力只有萨弗里蒸汽机的二十分之一，纽可门蒸汽机的六分之一。这个新型的动力装置刚刚诞生，英国的矿业中心康沃尔使用的纽可门机几乎都被瓦特机所代替。

随着蒸汽机的改善和推广，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急风暴雨般地向纵深发展。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此为契机，引发了机器制造业的繁荣和飞速发展，并引起了多种运输工具的大变革。

当时，机械制造业中的发明是非常多的。例如，1855年，有万能铣床问世；1867年，有六角车床。此外如龙门刨床、牛头刨床、钻床、锯床等特别是标准螺纹规亦不断出现。

机器业的发展促使了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形成和发展。这些都为交通运输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必要条件。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蒸汽机动力金属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逊制造出了第一部蒸汽机动力火车；1825年，英国正式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并试车成功。“轮船时代”和“火车时代”的到来，标志着资本主义机器化大工业生产的形成。

蒸汽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动力革命。它的影响和意义都是十分巨大的。正是在这些影响和在前人取得的这些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内燃机应运而生了。

蒸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于资产阶级彻底战胜封建阶级和最终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但是，随着蒸汽机的广泛推广和使用，人们在认识到了它的许多优点的同时，也越来越发现了它的局限性。例如，它体积庞大，应用复杂，效率偏低，特别是它还必须借助于外燃和蒸汽这个媒介方能工作。因此，研究制造一种新的动力机器来替代蒸汽机就越来越成为必然的和迫切的问题。

早在蒸汽机发明以前，就有人提出制造内燃机的想法。17世纪时，有人曾做过利用燃烧烟气冷却产生真空进行抽水的实验。1673年至1680年间，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提出了利用火药爆炸作动力来制造内燃机的理论，并试图制造真空活塞式火药内燃机，但没有获得成功。他的弟子巴本尔做过制造这种内燃机的实验，但也失败了。

1791年，英国人曹·巴尔贝尔拟定了气体燃料在汽缸中点火的方案。三年后，另一位英国的技师斯垂特参考瓦特蒸汽机的杠杆原理，提出一种用松节油和柏油作燃料的内燃机并取得专利。他的设计在内燃机发展史上占有更

高的地位，因为这是第一次提出燃料与空气混合的原理。1799年，法国化学家兰蓬第一次提出了用煤气作燃料的混合气式内燃机，并主张用电火花点火。然而这些设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亦未能获得应用。

1820年，英国人塞歇尔（Cecilw）发表了关于以所谓氢煤气为燃料的内燃机报告，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爆发后的真空构成推动活塞的力量，它在实验室里曾获得了每分钟60转的成绩。

1833年，另一个英国人莱特提出了所谓“爆发”发动机的专利，它直接利用燃气压力推动活塞做功，从而结束了真空机的历史。可是这个专利并未实行。1857年意大利牧师巴尔桑奇和玛特依西试验了“自由活塞”发动机，第一次实现了爆发成功。它采用的是齿条一齿轮装置联结活塞和输出轴，显然没有蒸汽机上的曲柄连杆结构合理有效，结果也失败了。

经过近七十年的探索，法国人里诺终于研制成功第一台足以适用的内燃机。它的外形和许多结构都和蒸汽机相似，它的燃料消耗极高，电点火也不可靠，但是它毕竟能平稳运转了。作为小型动力机很受中小企业的欢迎。内燃机第一次批量生产了。到此为止，不论是真空机还是爆发机，燃料混合气都是不压缩的，里诺发动机达到了这种无压缩发动机的最高峰。

里诺机投入批量生产以后，一方面掀起了研究内燃机的热潮，另一方面使人们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预先压缩混合气可以产生更多的热效率。

1862年，法国铁路工程师德·罗卡斯阐明了他的旨在提高内燃机的热效率的内燃机理论。罗卡斯认为，在内燃机点火前必须高压，燃气必须膨胀且迅速达到最大膨胀比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使活塞运动在四个冲程中完成，即实现四冲程循环。具体步骤为：活塞下移，进燃气；活塞上移，压缩燃气；上死点附近点火，气体迅速燃烧膨胀，活塞下移做功；活塞上移排出废气。罗卡斯内燃机理论的科学性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当时却不能不说是工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遗憾的是，他的发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在很久以后才被人们发现。于是这个发表于法国一家地方刊物上的内燃机等容燃烧四冲程循环理论直到十几年后才在实践中得以运用。在内燃机发展史上，人们通常认为，作为第一台真正的内燃机，应是德国工业家奥托于1876年制造火花点火式四冲程往复式活塞内燃机。这种内燃机的热效率较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已达到12~14%，后来又提高到20%。由于这种内燃机的显著特点，所以很快得到推广应用。据统计，仅17年时间，奥托内燃机就销售了5万台，这一方面是由于内燃机自身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还是因为自从1859年开始，美国开采了第一口油井，从此汽油和柴油逐渐成为普遍商品，为内燃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新燃料。随着内燃机的使用和推广，它很快又向新的方向——小尺寸发展了。与此同时，还有转动式内燃机（包括燃气轮机和转子发动机）的产生和演化。从而为运输式动力装置提供了高速发动机。1883年，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制成了第一部现代四冲程往复式活塞式汽油机，其转速一跃而达到800—1000转/分。

尽管内燃机在尺寸、便利等方面都胜过了蒸汽机，但是，气体燃料及昂贵的汽油都不能保证内燃机与蒸汽机竞争的能力。因此，在19世纪末叶，又开始出现了应用廉价燃料工作的重油发动机，这一阶段的发展是从德国工程师狄塞尔开始的。

1892年，他最后研制成功了使用低质油的柴油机。这种内燃机设想通过提高压缩比以提高效率，采用压缩点火的方法。狄塞尔的试验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他曾设想，在发动机中要采用高的预先压缩，以价格低廉的煤粉做燃料，保持燃烧过程的等温。这样既可以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亦能避免气缸中过高的温度。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准备把气缸中的温度限制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并停止气缸和气缸盖的冷却。然而，他的设想失败了。后来，他将燃料由煤粉改为柴油，将等温燃烧过程改为等压过程，终于在 1892 年试制成功了完全靠压缩着火燃烧的柴油发动机。

狄塞尔内燃机的效率是空前的，已高达 30%。这种柴油内燃机的出现，标志着往复式内燃机发明的基本完成。从此，这种内燃机进入了完全成熟的历史时期。

作为一种新型的动力设置，内燃机从其诞生后就被广泛地应用于交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等各部门。它的一个极其明显的作用便是提高了整个世界的速度——交通运输因为拥有了它而日新月异。以内燃机为动力的飞机和汽车相继出现在静寂的地球上。特别是汽车业的飞速发展和繁荣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最先使用内燃机作汽车动力的想法是在 1860 年提出来的。法国有一位工程师曾经在这方面做过实验，但失败了。他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发动机的体积过大，而功率偏小。人们通常认为，以奥托内燃机和狄塞尔柴油机闻名于内燃机史上的德国亦是汽车工业的第一故乡。其功臣则为戴姆勒和威廉·迈巴赫。戴姆勒最初在军械所当学徒，学到一手出色的手艺，后来又专攻机器制造，学到了丰富的科学知识。1872 年，他进入多伊茨燃气发动机厂工作，并认识了设计师迈巴赫。戴姆勒和迈巴赫的主要精力开始都集中在发动机上，其它附件并未引起他们多大的注意。不久，他们就在两轮车上安装了自己的发动机，初步获得成功。接着，戴姆勒又让车匠造了一辆马车，把车上的辕改为驾驶杆来操纵方向，由发动机驱动后轮，在比较平坦的马路上达到每小时 20 公里左右的速度。1889 年戴姆勒和迈巴赫在巴黎国际展览会上展出了他们设计的另一辆新车，用一个双汽缸的发动机作动力，架子是用钢制的，轮子是钢架实心橡胶带的，后人称其为“钢架车。”

真正与汽车的发明连在一起的是卡尔·本茨的名字。他的基本设想与戴姆勒和迈巴赫的根本不同。他的发明和设计活动一开始就把汽车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只着眼于发动机。本茨首次解决的是制造一种高转速的新型发动机，然后在处理点火系统的困难时，又采用了新的高压电火花方法。1885 年 10 月，他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辆汽车，具有现代汽车结构的一些基本特点。它不仅可以在每一条平坦的道路上行驶，而且还可以爬较大的斜坡，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并显示了汽车发展的广阔前景。

1893 年，巴黎举行了第一次汽车展览会，1894 年举行了第一次汽车比赛会。

1902 年，后来被称为“汽车大王”的美国人亨利·福特制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汽车——福特一号。为扩大生产规模，将汽车送进千家万户，福特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在大规模生产汽车的同时，也加强了技术攻关和革新。在不懈的努力下，福特汽车公司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例如，设计成功了 T 型汽车，改原来的固定轨道行驶为原野上的自由行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大降低了汽车的价格。1904 年的汽车售价为 8000 美元，而福特汽车公司所产的汽车由于革新技术和加强管理，售价降至 850 美元，几乎下降了 10 倍。于是，汽车从达官贵人的庭园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平民百姓的日用品。

美国的“汽车革命”带来了全世界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美国的汽车畅销到世界各地，每年能销售百万辆之多。1914年，全世界已有汽车200万辆。到了1927年，光是美国就达到了每年销售1500万辆的规模。从此以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了汽车的“足迹”。

内燃机发明以后，除了飞机和汽车外，在其他机械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在机车、船舶和工业等领域都逐步使用了柴油发动机。1901年，美国还成功地研制出了第一批拖拉机，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总之，只要人们翻开近代的历史，就会感到18、19世纪，是科学和技术全面发展的世纪。正如英国科学史学家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说到的：“如果18世纪的好奇而有远见的人，曾感到机械工业的来临，那么，到了19世纪中叶，世界上每一处，连最不经心的人，也不会不察觉它的影响。……广大的新城市纷纷崛起，……铁路把各工业中心联系起来……。”



## 日俄战争

翻开日本的历史，明治维新为它打开了通往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那么，日俄战争则是这个“太阳之国”以其强悍和坚定的态势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开端。

在太平洋的碧波中，有着一个形似人胃的国度，它就是大和民族的发祥地——日本。数千年来，勤劳勇敢的日本人民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随着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幕府逐渐成为它的统治核心。幕府的将军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只不过是精神上的领袖。天皇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最高主宰。

每一种制度都有产生、发展、衰败的时候，就像人有生、老、病、死一样。幕府制度也同样逃脱不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到了德川将军幕府时代，这一制度的矛盾更是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将军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其领地包括江户、大阪、长崎等经济发达地区，将军的政厅就是幕府。幕府领地以外的土地，分封给 260 余个大名做领地，即所谓“藩”。大名从将军处取得领地的领有权，同时向将军效忠，负担军事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义务，对自己领地的人民和家臣，却是独裁制的君主。这一制度与法兰克王国的领地分封制和中国西周的分封诸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将军和大名又将从领地上征收来的年贡米作为禄，分赐给家臣即通常所说的武士。

日本就这样被将军、大名和他们的武士，即封建领主阶级所占有、统治着。这些约占全国人口 10% 的领主和武士阶级，将他们的领地交给农民耕种，大部分征收实物地租，一部分旱田作物则征现款作年贡，或替领主付劳役，农民被剥削到不死不活，这就是前明治维新时代的社会现状。

幕府和各藩用种种办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便继续对农民进行剥削，剥夺农民的一切自由，强迫农民缴纳年贡和尽其他的义务。甚至农民迁移、转业、结婚也受到限制。

然而，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阻止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它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通过勤劳和智慧得出的结果。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江户、大阪以及各藩城市人口迅速增多，出现了少数像三井、住友、鸿池的大富豪，称霸全国商业界，并贷巨款给幕府与各藩。但是，这些大商人与领主之间矛盾很深，领主随时向他们征收重税，因此他们和广大中下层工商业者与领主处于对立的地位。这一批人后来成为“倒幕运动”火药库中的一枚重磅炸弹。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地主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在手工业和农业中。早期的资本家和地主一方面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受到领主的剥削与压迫，同样对领主深抱不满。幕府制度的腐朽性将新兴的剥削阶级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就越激烈。1837 年，贫苦市民的儿子太盐平八郎以其勇敢和坚韧，率领无产市民群众点燃了人们反抗的怒火，敲响了幕府统治的丧钟。

当封建的日本国内到处都充满危机的时刻，完成了资本主义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各强国，它们凭借装备优良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东方古老国家的大门，在东方建立殖民帝国体系，日本也未能幸免于

难。1853年美国海军首先叩开了日本的大门，紧接着英、法等西方强国纷纷效仿美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日本就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内忧外患引起了幕府危机的总爆发——倒幕运动。经过决战，幕府被推翻了。刚推翻幕府的日本还是个封建割据、列强横行的国家，维新图强是奋起的唯一途径。明治维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的。明治维新实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消除藩政，实行中央集权。开始是实行“奉还版籍”，变旧藩主为中央任命的藩知事，将藩主的家庭经济与藩财政分开，藩政治的基本方针必须服从中央。武士的俸禄由土地改为禄米，并削减其数目。还有废藩置县，命各藩的大名到东京居住，继续发给世禄。天皇政权在废藩置县成功后，紧接着便着手整顿它的统治体制。中央以正院为中枢权力机关，下设大臣、纳、参议，后以参议组成内阁，负责政策与法令的起草以及监督政务。地方政权分为三府七十二县。通过中央任命的知事以下的地方官，执行全国划一的行政。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富国强兵”成为政府最主要的目标，建立足以供应近代军备的工业。军队则实行征兵制和常备军制，建立天皇的御林军——近卫军。军队中枢机关由陆军省和海军省组成。这样，日本成为唯一不可分的统一国家。天皇成为唯一最高的绝对君主，文武官僚在天皇的名义下实行专制政治。明治维新是日本崛起的一剂良药，实行义务教育则是一味激烈的催化剂。日本通过九年义务教育，日本国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以后日本经济的腾飞、军队的迅速实现近代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天皇制政权把全国从九州到北海道统一为不可分的日本国，建立起深入全国每个角落的中央集权统治，嗣后致力于收回国权，并且显示出雪耻的决心。通过精神战争，赢得了全体国民的拥护，广大群众的拥护就是收回国权的根基。通过和西方各帝国主义的艰苦谈判，特别是由于日本统一的完成，经济的发展，民族意识的增强，内外夹击，促使西方列强放开了踩在日本背上的脚，为日本今后的自由发展松了绑、解了围。

于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了日本的当务之急。日本还大量地引进先进技术和近代化机器。明治维新使日本过渡到资本主义，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日本经过发展已经逐渐追上了西方列强。但也和西方一样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于是把日趋没落的清王朝作为进攻的首要目标，同时把朝鲜作为日本帝国大陆政策的起点站。

19世纪90年代的朝鲜处于李氏王朝的腐败统治下，国王卖官鬻爵；官僚横征暴敛；贵族阶级残酷剥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1894年2月，朝鲜东学党在全罗道揭竿而起，清政府与日本都派兵入朝，以图控制朝鲜。日本以其新兴国家蓬勃的朝气，在朝鲜转败为胜，取得优势，并在国内大造舆论，东洋武士的战斗激情被充分发动起来了。与此相反，江河日下的大清帝国在这件事上先是占优势而后居不利，后又在外交上受到挫折。经济上的落后，使昔日枭勇善战的清朝八旗勇士不堪一击。形势大大利于日本。7月25日凌晨，由“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组成的舰队发射了揭开日清战争的第一炮。9月15日日军山县第一军团司令官亲率第三师团围攻平壤。平壤一战，清军损失惨重，并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形势极为不利。嗣后的黄海海战，日军以稍占优势的舰队击败北洋水师，促使李鸿章作出保船的愚蠢决定，注定了北洋舰队覆灭的命运。继而日本武士的太阳旗相

继插在旅顺、威海卫、海城，清朝军队溃败，一发不可收拾。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重操旧业，担起议和的全权大臣职务，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速了中国的殖民地化。

日清战争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对外战争，它的胜利把整个国民的感情动员到战争上去。

日清战争，日本击败了中国，那么，在其称霸亚洲的道路上，俄国就成了它的主要绊脚石，一个比中国强大得多的对手。

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悠久，可上溯到清朝初年，17世纪40年代，沙俄开始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明末清初，沙俄侵略者窜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并在雅克萨、尼布楚两城建立基地，继续侵略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清政府多次致书劝阻无效，康熙帝决定进行自卫反击，驱逐侵略者。

1685年，康熙帝命都统彭春，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统率水、陆两军进攻俄军占领的雅克萨。俄军伤亡甚重，被迫投降，清军平毁雅克萨城而返。但清军撤走后，沙俄侵略军又重占雅克萨。1686年，康熙帝命令清军再次讨伐，清军包围雅克萨半年，俄军伤亡殆尽。沙俄政府被迫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的领土，明确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晚清时期，清政府腐败没落，国力逐渐衰弱，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后，沙俄也在中国东北进行侵略掠夺。1858年签订《中俄璦琿条约》，强占了中国东北大量的土地。1864年清政府又被迫与沙俄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又强占了中国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强盗的野心总是贪得无厌的。1900年7月上旬，沙俄政府动员12个军区的部队，共计步兵128个营及一个连，骑兵78个连，大炮340门，17万余人的庞大军队，兵分七路，先后侵入我国东北边防要地。沙俄的入侵遭到了中国军民的激烈反抗，俄军付出重大损失后，占领了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至此，俄国独占东北的局面逐渐形成，控制了东北各战略据点，占有铁路运输权，在旅顺军港驻有强大的远东舰队，有海参威的拱卫……。当时俄国陆军大臣曾厚颜无耻地说：“沙皇陛下的壮志已酬，俄罗斯将屹立于东方。”

日清战争后的日本成了新崛起的、实力不弱的帝国。战后，它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内容是：在亚洲东部海岸外设立一道屏障，并且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屏障以内的领土，这就是所谓“大陆政策”。实现这一政策的具体步骤是，首先占领亚洲的太平洋沿岸，然后以朝鲜为跳板，插足东北，然后吞并整个东北以至全亚洲。早在1890年，日本著名战略家山县就制定出了侵略大陆的战略方针，十分强调大陆政策对日本帝国的重要地位。

日俄都在侵略中国，这就产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俄国自恃国力强大，不仅强占中国东北而且还瞄着日本口里的朝鲜，日本也力争斗垮俄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强相争，势在必得，战争迫在眉睫。

在战争发动以前，日本人深知，俄国虽然国内动荡不安，经济不景气，但毕竟沙俄是军事强国。日本虽是新兴国家，发展很快，但终究有根底浅的毛病。为了克服自己的不足，日本在外交上展开了攻势，利用英俄矛盾，向英国频送秋波，最终结成英日同盟。同时，日本还大力发展重工业。“马关条约”的战争赔款，给日本工业界注入了充足的血液。有了英国的同盟，又有了几年的苦心经营，日本就准备发动战争了。

1904年，日本首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挑起了日俄战争。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驻旅顺的俄国远东舰队，战争爆发了。

俄国在战争中反应不灵敏，直到2月17日才组成以陆军大臣克鲁巴特金为首的远东军司令部。军队在国内的集结也非常缓慢，而日军则严阵以待，作好了充分准备。2月9日日军派遣舰队在仁川击败俄舰，取得朝鲜海面的制海权。于是日军第十二师团在仁川登陆，在鸭绿江边的义洲与近卫师团及第三师团组成第一军。大将黑木为桢任军长指挥第一军，威逼辽东。俄军主力则纷纷集结于九连城，并分兵驻守安东、水口镇，作为犄角，于日军对峙。29日夜，日军渡河发动进攻，俄国军队被日本军队打得大败，三天之内，重镇九连城、凤凰山相继失陷。

旅顺是俄军在东北的军事支点，又是远东舰队的母港，军事地位相当重要。日军由大将奥保巩为军长，以第一、二、四师团组成第二军，于5月5日登陆，进攻旅顺的屏障金州。日军不畏狂风暴雨和严密的火力网，发动进攻，26日克金州，切断了旅顺的后路。

为了取得战争主动权，日军大本营以日清战争中战功显赫的乃木希典为军长，组成第三军，发动向旅顺的攻击，第二军从中配合行动。7月24日，第二军攻占大石桥，俄军南下的通道被堵死，旅顺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城。

刚开始，日军大本营考虑到第一、二军相隔太远，恐怕孤军深入，被俄军分割包围，为了互相支援，于是以第十师团为核心组成第四军，向分水岭出发，填补一、二军之间的空隙。7月13日攻陷水城，此时，日本以大本营主要成员组成满洲军总司令部，大山岩为总司令，儿玉源太郎为总参谋长，统一指挥进入东北的日军。9月4日，通过浴血苦战，日军攻克辽阳城，此役日军死伤高达1.7万多人，是开战以来损失人数最多的一次。占领辽阳即取得了战略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

日军虽然连战连胜，但并没有达到歼灭俄军主力的目的，况且俄军援军源源东来，形势不容乐观。俄军统帅克鲁巴特金是名泉勇善战的将领，他临危不乱，在守势受挫时，主动发起进攻，当援军到达时，克鲁巴特金当机立断下令全线反攻，日军以其全部兵力全力拼争，日俄战争中最大的战役就这样开始了。战役过程中，俄军统帅在敌情判断上出现失误，被日军出奇兵切断奉天（今沈阳）以北铁路，俄军陷入重围，不得不下令退却。这时，日军趁势围攻旅顺，由于旅顺的不同凡响的地位，俄军设防极其严密，驻有十余万精锐部队，日军围攻以乃木希典的第三军为主力。乃木希典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投军，从列兵做起，30余岁就名闻整个陆军，被称为“樱花将军”，在日本受到人们的尊敬。这位铁血武士到日清战争的时候，已是一名统帅7000余人的少将混成旅团长。在日清战争时期，他率领所部，参加进攻平壤、进占九连城、在莱成湾登陆，立下了汗马功劳。到日俄战争时，他成了显赫的统帅千军万马的陆军大将、第三军军长。能为天皇陛下东征西挡，开拓疆土，是他一生中的最大荣耀，因此，他受到军部大本营的器重，让他担任主攻旅顺要塞的任务。他非常高兴，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攻下旅顺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旅顺，李鸿章在那里经营了许多年，具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多处炮台，而俄军占领旅顺后又加强了各种工事的稳固，俄军还有10余万精锐部队在旅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日本人想攻入旅顺是非常困难的。

面对这种情况，乃木希典在昏暗的指挥所里焦急地来回踱步，并时不时地跳到地图前盯着地图看。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官此刻他需要的是冷静、沉着、

坚定和勇气。围攻旅顺的战斗已持续了一个多月，日军伤亡日渐加重，而旅顺依然坚固地在俄军手中。后来，乃木希典将军用“肉弹战术”进行攻击，于是，战场上出现了无数身绑炸弹的敢死队员，使俄军吓得目瞪口呆。经过双方的殊死决战，日军终于于3月5日攻破了旅顺。这一战役非常艰苦，历史罕见。日军为此付出了高达4万人阵亡、9万人受伤的血腥代价，终于占领了这座坚固的城市。战争持续了四个月，最终以日军的胜利而告终，标志着日俄战争的主要陆战大致结束。同时，乃木希典也因旅顺之战的胜利名震东洋，被日本天皇封为“圣将”，死后供于靖国神社最尊贵的位置。

双方在进行陆战的同时，也进行了海战。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大力发展其海军核心——联合舰队，在日本的大力发展和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的领导下，日本海军一跃而成为可以与西欧列强舰队争高下的强大力量。海军的军舰首先打响了日俄战争的第一炮，随后，日本海军对俄国的远东舰队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在旅顺之战中，日军舰队击败了俄国的远东舰队，同时当陆军进攻旅顺时，海军舰队封锁了海面，并以猛烈炮火支援陆上作战，助了陆军一臂之力。

要说海军最光辉的战线，当数对马海战。俄军远东舰队被歼后，拿出了看家本领，以波罗的海舰队大部分组成第二太平洋舰队，以罗哲斯特温斯基海军中将为司令，开赴远东战场。当旅顺陷落后，又以波罗的海舰队剩余舰支组成第三太平洋舰队，东征太平洋。由于英日同盟的关系，英国拒绝俄国舰队通过苏伊士运河，俄国舰队被迫绕道好望角，4月18日两支舰队会师于北部湾。并伺机进入海参崴。日本事先正确判断出俄军意图，并将联合舰队倾巢而出，埋伏于俄舰的必经之路——对马海峡。5月26日深夜，对马海峡，一名身材矮小但十分精悍的海军将领，屹然站立在战舰的前甲板上。他紧锁双眉，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黑暗，四周是庞大的舰队，他就是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东乡大将出身豪门世家，东乡家族是长州军阀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本人行伍出身，和乃木希典一样，具有卓越的领袖才能，联合舰队在经营下，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此时，他正在进行紧张的思想斗争：如果俄国舰队此时转而进攻旅顺那将是何等惨状！如果此战失利，大日本帝国将走向何方？……但是，作为一名伟大的军事家，他有极其坚强的意志，有勇往直前的决心，决不会因为一些顾忌而放弃这次生死攸关的决战。刚才，他已向全体海军将士发布临战动员：“此战关系帝国命运，我忠勇将士当决死一战，以报皇恩！”这段话后来成了日本海军每次决战前的例行动员。他几天几夜没合眼了，但战斗的激情使他毫无睡意。他还有好多事要做，他想象着战斗中将出现的每一个细节……

时间在慢慢地流逝。日将黄昏时分，猛然间发现俄舰上高高的桅杆出现在海天相接处，东乡大将猛地将手用力地向下一挥，顿时，联合舰队像一群凶狠的猛虎，向俄国的太平洋舰队猛扑过去。俄国舰队被一阵突如其来的轰击打昏了头，日舰拼命地向前猛冲，双方接战不及半小时，俄舰处于一片混乱。嗣后，日方又集中主力舰乘夜进攻，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灭，俄军主帅罗哲斯特温斯基等被迫投降。对马一战，日本击溃了俄国的主力舰队，获得了海战的彻底胜利。

对马海战使日军大获全胜，但是日本陆军此时已兵源枯竭，无力再战。而俄军尽管海军一战失败，但陆军却顺着西伯利亚铁路源源东来，此时双方都无力取胜。旷日持久的战争，势必两败俱伤，于是谈和之议就提到议事日

程上来。

在日俄双方均陷于困境的情况下，190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争夺太平洋地区霸权，乃出面调停。双方于9月5日签订了《日俄朴茨茅斯条约》及其附件。通过条约，日本取代沙俄攫夺了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日本还取得其他一系列特权。

日俄战争的结局预示着日本已经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使日本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强国的压迫，与它们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共同逐鹿天下。同时也使日本进一步加速军国主义步伐，成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

